

溫柔的權威：十九世紀湯恩比館的發展

黃彥宜

湯恩比館向來被視為是社區工作的起源，以及社區和大學相互連結服務貧民、共創和諧社區的典範。19 世紀的英國自由主義盛行，強調個人責任，貧窮被視為是個人道德缺失。以湯恩比館為核心發展的睦鄰中心（settlement house）運動在當時階級劃分嚴明的英國社會，不採馬克思階級革命或費邊社（Fabian Society）（註 1）的路線，而以教育為重心展開社區服務，希冀藉由中產階級的學生菁英和東倫敦區的住民共同生活以解決貧窮問題。

本文主要探討湯恩比館發展的社會脈絡，及 Samuel Augustus Barnett（註 2）牧師如何從認同慈善組織會社的理念而後和其有所分歧，並從環境論出發，在東倫敦區設立睦鄰中心，以及近代的社區工作者

對湯恩比館的評價與定位。

一、維多利亞末期的社會經濟狀況

19 世紀的英國因為兒童存活率提高、人口壽命延長，加上愛爾蘭因為馬鈴薯歉收鬧飢荒，失業問題嚴重，許多愛爾蘭移民移入，人口因而快速增加，至 19 世紀末增加近 3 倍。工業革命後，大量農人從鄉村遷移到都市的工廠謀生，找工作者眾，工資經常被壓得很低。為數眾多的工人湧入都市，造成住宅嚴重缺乏、居住環境擁擠、租金昂貴，衛生條件惡劣（Daniels, 2003）。

都市成長和經濟擴張也造就了一群有錢的「中產階級」，他們從工業、銀行及商業獲取利潤。「中產階級」是描述一群在貴族之下，工人之上的人，他們挾著在經濟上成功的經驗轉戰政治場域，以維繫利益。勞工階級雖然被社會鼓勵要

去改善自身處境，但也經常被提醒要滿足身為工人的現狀（Loftus, 2006）。

然而，一群有技在身、經濟狀況較富有的都市勞工階級開始透過工會運動及新工會主義（New Unionism）爭取權益，不再消極地接受既有的弱勢地位（Popple, 1995）。新工會成立於西元 1889 年，把非技術工人也納入其中，它和 19 世紀中的手工業工會（craftunions）採友好會社（friendly societies）（註 4）的運作方式不同，主要憑藉罷工以達至目標。另外，Henry Hyndman 於 1881 年組織「民主聯盟」（Democratic Federation），1884 年改採馬克思主義路線，更名為「社會民主聯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費邊社也在 1884 年的成立，這些組織均扮演著意識的提升的角色。

1870 年代早期，英國經濟受到西歐及美國的競爭，新興的中產階級開始對未來感到不確定，加上勞工運動的激進化，執政黨也意識到需獲取更多勞工階級選民的支持。面對日益增多的窮人，中產階級開始質疑自由放任的政策無法有效處理日益惡化的社會情境。英國優勢貿易位置受到挑戰也讓政府重新檢

討既有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解決策略，採取社會和教育改革（Popple, 1995：8～9）。

然而，中央政府只介入處理會影響自由貿易和經濟效率的相關問題，其餘的多由地方政府主責。「地方的問題，地方自己解決」是當時政策的主調，雖然地方政府服務擴充不少，但整體而言，維多利亞時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對社會服務的投入相當有限，教會和志願服務團體是重要的服務提供者。在湯恩比館（Toynbee Hall）成立前即有 Edward Denison 和 Octavia Hill 所推行的社區方案和慈善組織會社的設立。

二、睦鄰運動的先驅

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價值認為窮人道德和智力低落，無法自我控制，浪費、酗酒或賭博成性，而且富貴貧賤是上帝的安排，不能加以打亂。當時的經濟政策強調自由放任，政府作最小的干預，重視自助，個人需為自己的將來負責。而新興的都市中產階級更重視競爭、節儉、審慎、自賴和個人成就等特質，以便和優越的世襲貴族有所區別（Loftus, 2006）。

慈善組織會社於 1869 年設立，

它反映了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價值，強調個人責任和道德。因為自助和慈善救濟的價值是衝突的，慈善組織會社為避免造成依賴文化，將窮人區分為「值得幫助」和「不值得幫助」，有的家庭是因為外在情境而致貧，對自重的家庭應該給予協助，有些人是因為意志不堅及犯錯，他們需要道德的革新並加以管束。

除了慈善組織會社外，當時也有兩位社會改革者 Edward Denison 和 Octavia Hill 發展社區方案以協助窮人。1860 年英國經濟蕭條，Denison 批評公務員在東倫敦區施捨食物、衣服和提供庇護是將教區「去道德化」，把居民變成不負責任的乞討者。他強調改革者需走入社區和窮人住在一起，不只是提供協助，同時也要再造真正的社區，讓居民不分貴賤為共同目標而付出。Denison 到 Stepney 和窮人生活在一起，他希望窮人將其視為道德領袖，不為了改善經濟狀況而依賴他。他在該地著手建學校、聘用有薪給的教師、給予獎勵、組織工人俱樂部等，鼓勵窮人自助。Denison 的名言是「把你的腦袋借給他們，但不是給他們錢」。Denison 在 1870 年代於 30 歲英年早逝

（Meacham, 1987: 4~7）。

湯恩比館常被視為是睦鄰運動的先鋒，其理念是「讓不同階級產生互動；讓他們彼此瞭解和相互學習；讓接受幫助者也可以付出」，而 Edward Denison 方是實踐的先驅，是第一位徙置者。因為東倫敦區房屋狀況很差，湯恩比館重視居民參與工作方向的訂定及加入「衛生改善委員會」（Sanitary Aid Committee），並將住屋情況告知地方政府，是承襲 Denison 的作法（Cosmo, 1935: vii-viii，引自 Pimlott, 1935: 11~13, 49）。

Octavia Hill 是慈善組織會社的重要成員，她在 Marylebone 推動將破落房舍改建成都市小集村的實驗方案。她認為住宅更新不只是改善物理環境，也是一個瞭解和訓練居民一起工作和促進互信的手段。隨著方案慢慢擴充，Hill 僱用許多房租收費員，並加以訓練，方案的成功多賴那些辛勤工作的女性收租員的投入。她在 1874 年的文章寫到，收租員需像個「女王」和「朋友」，她們扮演著組織者、改建者、支持者和紀律維繫者的角色。許多房東對 Hill 的管理能力頗為信服，把 5% 的利潤作為投資，方案也因此不斷發展。至 1880 年代早期，

約有 378 個家庭（約 2,000 人）住在她管理的房舍下。

Denison 和 Hill 對窮人的態度都不脫維多利亞時期的慈善家長主義，「中產階級」的慈善家知道什麼對「窮人」最好，因為他們有道德、能力和「腦袋」。和慈善組織會社不同的是他們投入社區環境的改善，工作人員和居民有較緊密的連結和互動。1884 年英國第一個睦鄰中心：湯恩比館，強調大學生徙置於貧民區和窮人生活在一起，其作法受到 Denison 和 Hill 的影響頗深。

三、湯恩比館成立的背景

英國在 19 世紀中葉勞工運動和工會示威迭起，訴求改善工作環境、降低工時和調高工資，反對「新濟貧法案」取消院外救濟並將窮人強制送進令人憎恨的勞役所（work house）（註 4）。而法國大革命對當時的英國社會也帶來許多衝擊。

在當時，貧窮被視為是道德淪喪，也是工業體系不可避免的現象。不只是商人階級漠視貧窮，教會也不關注社會議題。紐曼主教（Cardinal Newman）在其晚年承認，他從未將信仰和關注社會議題

相連結，窮人是教會展現慈善和同情的對象。紐曼主教認為窮人是慈善的工具，意味著對窮人的漠視（Pimlott, 1935: 1~2）。

Carlyle 是首位透過小說提醒民眾英格蘭是「一個國家兩個社會」，呼籲對窮人的社會責任。爾後如 Dickens 等也陸續用作品聲援該訴求。報紙專欄和小冊也陸續報導倫敦勞工和窮人的處境。James Greenwood 的倫敦七惡（seven curses of London）於 1869 年刊出，詳細紀錄窮人階層的生活，包括赤貧的兒童、娼妓、罪犯、乞丐，並提出建設性的移出人口和更有組織的慈善活動。然而訊息的報導並未引發實際的作為。基督社會主義者（Christian Socialists）呼籲針對貧窮問題進行診斷和提出改善，他們認為工業社會殘酷如戰場，要用基督的合作精神取代競爭的理念（Pimlott, 1935: 3~4）。睦鄰運動是對當時社會種種問題的回應，罪惡感是改革的起點。

1883 年 10 月中旬 London Congregational Union 贊助出版「被遺忘倫敦的悲泣」（The bitter cry of out-cast London）一書，描繪了倫敦東區種種道德淪喪和令人心碎的悲慘事件，並疾呼被上帝遺忘的地方就

位於英國第一大城的市中心（Briggs and McCartney, 1984）。該小冊的描述如下：

一大堆男人和女人擠在如鳥巢大小的惡劣環境中，許多人擠在一起的恐怖景況，讓人恍如身在奴隸船，四處瀰漫著從下水道和垃圾堆所散發的惡臭和毒氣，很多垃圾就在腳下漂浮。住的地方沒有一絲陽光可以穿透，也沒有一點的新鮮空氣流動。亂倫和其他不道德的事是不可避免的的結果，工資低到不能再低（Pimlott, 1935: 25）。

Barnett 是一位牧師，和他的太太 Henrietta 自 1873 年在東倫敦區白教堂（White chapel）的 St Judge 服務。Barnett 認為該書對東倫敦區描述雖然聳動，但也顯示是該作一些事的成熟時機。他與牛津和劍橋大學有許多連結，因而呼籲讓那群最優越的菁英到東倫敦區和窮人生活在一起，以提供給窮人多樣的生活，並透過共同生活的體驗，機會教育未來的領導者和意見領袖。Barnett 曾到牛津大學演講，當時的聽眾即後來的 Canterbury 主教 Cosmo Gordon Lang 回憶：

Barnett 並沒有用特別激昂或誇張的言詞，只是邀請大家到東區看

看，體驗一下對大家而言是奇怪又陌生的東倫敦區生活。他也並未強調什麼事非作不可，而是告訴聽眾去想想自己可以作什麼（Briggs and McCartney, 1984: 6）。

Barnett 對那些到東倫敦區只希望看到悲慘或驚聳景象的人不是很有耐心，他希望能對東倫敦區有更正確的描述，而不是那麼聳動，免得西倫敦區的人到那裡一看，會覺得很失望，因為居民看起來沒那麼淒苦悲慘。他強調提供慈善救助者需和窮人生活在一起，如此一來方能有第一手的經驗以瞭解貧窮所導致的問題。1884 年 Barnett 在東倫敦商業路設立了第一個睦鄰中心，名為湯恩比館以紀念曾在東倫敦區從事調查和服務，因過勞於 30 歲英年早逝的 Arnold Toynbee（註 5）（1852～83），該館被視為是睦鄰中心之母（Rimmer, 1980）。

睦鄰運動承襲慈善組織會社和基督社會主義的理念，認為解決貧窮問題不是靠記者或作家的報導而是需要科學調查，並透過教育而讓窮人有更開闊的生活，窮人需要領導者。Barnett 雖然以 Toynbee 之名設立第一個睦鄰中心，但其實施理念並不全然延續 Arnold Toynbee 的論述，某些理念上也和慈善組織會

社有所歧異。

四、Arnold Toynbee 的理念

Arnold Toynbee 是英國的經濟歷史學者，於 1878 年自牛津大學畢業後即留任講師，他積極地在校外進行社會改革，和其夥伴住在白教堂進行貧窮調查，並鼓吹大學生進住貧窮社區。Toynbee 和哲學家 Thomas Hill Green 亦師亦友，Green 的哲學論述強調社區的重要性及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同時反對階級區分。

Green 的思維影響 Toynbee 極深，Toynbee 認為靈魂要的是一個安頓的地方，有錢人和中產階級對窮人都有罪愆，中產階級有義務為窮人提供服務（Briggs and McCartney, 1984）。他曾在 1883 年演講中向東倫敦區的工人懺悔，他說道：「我們一直忽視你們，給你們慈善救濟而不是正義，給你們嚴格和不真實的建議而不是同情」。和 Green 不同的是 Toynbee 更強調政府的角色，當人們沒辦法為自己提供什麼的時候，政府需介入提供所需。Toynbee 反對馬克思主義者，強調務實的社會主義，經由財富再分配、增稅和政黨以解決階級衝突，無須透過革命，他認為要相信資本主義

者，並運用他們的財富，勞工和資本的最佳利益在於合作，而不是對立（Woodroffe, 1962）。

Toynbee 的思維提供湯恩比館的立論基礎，希望透過睦鄰運動消弭階級衝突，但不去變革既定的社會和經濟結構。然而，Barnett 是一位實作者，哲學的思考超過他的能力也不是他所關心的，他不似 Toynbee 或 Green 的行動背後有抽象的哲學理念支撐，Barnett 是從實踐中進行觀察和思考（Meacham, 1987）。

五、Barnett 在湯恩比館的實踐

Barnett 剛投入白教堂的服務時是抱持著自助的教條，和慈善組織會社的理念相同，同樣把窮人區分為「值得幫助」和「不值得幫助」。1880~1881 的嚴冬，白教堂準備發放每週 12~15 先令的救濟金給窮人，但條件是沒有工作的男人需到勞役所（workhouse）去。當時普遍認為錢賺得不夠是工人的錯，因為他們懶惰或浪費不知節約。George Lansbury 是一位東倫敦區的社會主義者，畢生投入為窮人爭取更人道的協助，他在自傳中寫到，他曾去信 Barnett 告訴他一些真實的案例，得到的回覆卻是勞役所是那些人最好的去處（Briggs and

McCartney, 1984)。

Barnett 是慈善組織會社發起成員之一，因為對慈善組織會社無法改善窮人的生活和工作狀況感到不滿，轉而強調貧窮狀況的惡化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嘗試以不同的取向提供服務。他不像慈善組織會社的行政人員認為提供服務前需先瞭解接受幫助者是什麼樣的人，Barnett 堅持任何窮人都值得給予一個健康及愉快的環境；若一個人失敗了，必須先把他們放到一個可以引領出好的自我的環境，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事；若成功了，那很好，若失敗了，才可以說他們「不值得幫助」(Baldock, 1980)。

Barnett 的作法某些程度偏離慈善組織會社的原則，兩者間衝突也愈加尖銳，因為慈善組織會社無法接受他的環境理論。Barnett 的論述在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工作圈雖是個意識型態的大突破，他試圖瞭解窮人的處境，而不是認為是他們人格缺失或能力不足，是經濟體系造成窮人的不幸，但他仍堅持階級必須存在，並不認同費邊社會主義 (Fabian socialism)，而是設計了睦鄰中心的組織。睦鄰中心設立的理念在於：

讓劣性大學生成為窮人的鄰居，分享他們的生活，思考窮人的問題，學習耐心、友誼、自我犧牲及運用自身的教育去提供協助。如此一來可以弭解階級分立的不幸和漠視 (Barnett, 1919: 310, 引自 Manthorpe, 2002: 409)。

東倫敦區是個移民社區，主要移入者為猶太人和愛爾蘭人。到睦鄰中心的大學生需負擔自己的費用，他們或參與睦鄰中心、地方政府和學校的活動或是協助執行濟貧法。湯恩比館的主要參與者是一群上層階級的慈善家或改革者，而不是政治革命家，Barnett 的理念充滿家長主義和威權主義，他的目標在教化窮人，並強調國家對那些拒絕自我負責的人需有一個行為標準的底線，他並提高分貝責難拒絕為社區整體利益合作的人，認為他們沒有自重的能力，是社會的無藥可救者 (Meacham, 1987: 69~74, 114)，教育是湯恩比館實踐的重要策略。

六、教育是湯恩比館的重心

湯恩比館是一個教育睦鄰中心 (educational settlement)，許多方案深受 Barnett 的工人大學 (workingman's university) 理念所主導，教育是文化和生活的媒介而

不只是職業訓練 (Pimlott, 1935)。

Barnett 認為社會進步的動力在教育，他希望投入湯恩比館的男性成員能夠保有他們原有的中產階級生活，而不是專業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如此一來方能和窮人有更好的融合以提供多樣的生活方式 (Briggs and McCartney, 1984)。Barnett 希望窮人和富人有近距離的個人接觸，繼而不知不覺地融為一體，開始徙住時對鄰居要很友善，經常舉辦宴會，不論形式是娛樂活動、閱讀、畫畫、演講、跳舞或音樂會，參與者會在交會過程發現樂趣。

湯恩比館的演講和課程都採小班制，以便讓老師和學生有充分的互動。早期的課程安排都是希望激起「高層次」的思維，包括「18 世紀的音樂」、「空氣和水的物理特性」、「最早的四個都鐸王朝」、「韓德爾和巴哈的作品」等，但也安排了少數實用的課程，如縫紉、急救等，1893 年又加入簿記和會計。Barnett 認為教育是促進社會和諧以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的方法。湯恩比館男童俱樂部的活動設計即希望藉由尊重傳統、秩序和權威以促進社會和諧 (Meacham, 1987)。

Lord Beveridge 曾寫信給他的母親說湯恩比館就像人文教育的研究

所，並對很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罪愆提出異議 (Woodroffe 1962: 68)。湯恩比館的學生相信，社會的改善可以藉由教育與和平的方式，透過「演化」而不是「革命」而達至。社會是和諧，不是衝突的 (Briggs and McCartney, 1984)。湯恩比館背後的理念是相當精英式的思維，他們所推動的是高等教育，是大學教育的延伸中心。

「公民參與」亦是睦鄰中心的核心價值，Barnett 鼓勵大學生在學期間能先在鄰里參與或履行公民職務。湯恩比館強調學生參與社會運動或委員會，擔任教育管理者和教士等職務，有一個真正的位置可以和其他人接觸、學習和提供指導 (Woodroffe, 1962: 68)。

湯恩比館設立之初，並未有女性進駐，雖然 Barnett 並不反對女性主義也支持婦女投票運動，但擔心婦女的加入會造成湯恩比館被女人攻占的印象，而讓男性成員怯步。儘管他的太太 Henrietta 在湯恩比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卻被視為是一個無性別的夥伴 (Meacham, 1987: 47)。爾後在 Henrietta 的影響下，慢慢發展男女混合和婦女的睦鄰中心。在那個婦女的生涯發展受到很多的限制年代，男性留在睦鄰中心

是他們生命中的短暫插曲，但許多婦女卻視睦鄰中心是自我發展的重要機會（Seed, 1973: 29; Walton, 1975: 50）。

七、湯恩比館的轉型與沒落

至 19 世紀末英國約有 30 個以湯恩比館為模式而發展的睦鄰中心，多數位於大學城。Barnett 也寫了很多文章凸顯他對專家、專業主義和權力的不信任，希望看到社會工作及社區工作漸漸變得不需要而至消失（Popple, 1995: 10）。

1900 年 Barnett 承認湯恩比館的作法並沒有讓東倫敦區的窮人和其領導者有更貼近的交流與溝通。教育活動也開始沒落，以前的課程經常有 100 多位成員參與，後來慢慢減至 20 多位。湯恩比館除了經常受到社會主義者的批評外，社會學家也加入批判的行列。Barnett 並未放棄他的初衷，只是把教育轉向社會調查。

1904 年 Barnett 在文章中指出需要對社會情境有更正確的知識，並建立一些事實資料以瞭解有多少兒童正處於飢餓和營養不足、工人的休閒生活及嬰兒死亡率等，慈善家和公部門都需要知識以對問題進行科學的處置。Barnett 開始支持

C.Booth, B.S. Rountree 和 E.J. Urwick 的社會調查。Barnett 並不關心社會調查和分析的方法論，他之所以支持是因為社會調查可以帶來社會改善及修正公眾的意見。他不太支持無名氣的社會學者所進行的研究，因為不會引起社會關注（Meacham, 1987）。

Urwick 於 1902 年寫了一篇評論，他提出睦鄰中心對很多人而言，只是一個在窮困的都市社區短期、暫時投入的居民組織。很自然地，為了證明投入者的奉獻是明智的，就需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儘可能加快速度工作。就像「機械手」一樣，在一個目標明確的組織內按部就班地工作。然而睦鄰中心的理想是與周遭的居民建立自然的互動關係，繼而產生更多的同情和瞭解，設立的初衷是反對機械性，但現在卻成為機械式的中心，高度機構化，背離初衷。Urwick 後來離開湯恩比館，顯示 Barnett 逐漸地無吸引和留住年輕人（Meacham, 1987）。

Barnett 也抱怨志工缺乏先期徙置者的智慧和深度，愈來愈難網羅像早期那一批在 Green 和 Toynbee 的理想主義教導下，為理解生活目的而投入，肯吃苦耐勞、自我犧牲和堅定地追求目標的大學生。

Barnett 認為那是大學教育精神的淪落，無法把庸俗的男孩變成具高尚心靈的年輕人，1900 年他寫信給他的哥哥抱怨，昂貴的大學變成只有小學的理念（Meacham, 1987: 102～121）。

2007 年的東倫敦區仍然是英國最貧窮的社區之一，湯恩比館仍持續在該區提供服務，並保留傳統提供徙住名額，讓志工住在社區提供一年的服務。目前每年約有 400 名在地或來自其他地區的志工投入慈善服務。湯恩比館分成幾個部門，提供多樣的慈善服務以協助兒童、青少年、老人和婦女及亞裔移民社區，經費主要來自私人捐助。提供的方案有兒童青少年藝術方案、法律服務，針對低收入戶提供財務及債務諮詢協助他們有效管理金錢，為獨居老人辦理音樂會、藝術、瑜珈等活動，及提供從娼婦女的相關服務。

檢視 19 世紀發展的社會改革方案，從保守到激進的光譜，依次為慈善組織會社——湯恩比館——費邊社——馬克思階級革命。Barnett 不採慈善組織會社的個案處理模式或將窮人分為「值得幫助」和「不值得幫助」，而是致力於關照窮人值得協助面，把文化和教育帶入東倫

敦區。湯恩比館是在鄰里層次實踐社會改革，不似費邊社關注結構和資源再分配的議題，Barnett 對社會和諧比對經濟公平更關注，更遑論採馬克思的階級革命。雖然湯恩比館也鼓勵學生志工參與社會運動，不過其著眼點是公民責任的實踐，讓學生菁英有一個位置得以教育貧窮的勞工，而不是為達致社會變革或是權力的重分配。

湯恩比館的實施理念是家長主義式的，透過教育方案補償窮人教育機會的不足，某些方面也是一種控制式教育，灌輸上層階級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讓窮人接受他們的處境，而不是去質疑它，以促進社會和諧。湯恩比館在鄰里運用志願服務人員提供服務，在人力和資源上面臨許多不確定和不穩定，實無力處理貧窮等錯綜複雜的結構議題。此外，讓社會菁英和窮人一起生活以達相互理解並進行社會改革的作為也過於浪漫，Barnett 也承認湯恩比館的作法並未成功地消弭階級衝突。

睦鄰運動強調由社區成立團體，自助處理問題的理念對英國社區工作有深遠的影響，福利國家體制建立前，社區工作多由政府支持的機構及睦鄰運動所推動，以便整

編有大量失業勞工的社區，學者稱此取向為技術取向（*technicist approach*）。技術取向強調在既有的社會關係脈絡下運作，以促進社區的主動精神、建立自助及非正式的資源以補償公部門在福利服務提供上的不足（Mayo, 1998）。1960 年代英國社區工作採社會運動取向，視社區工作是轉變壓迫、歧視或剝削社會關係的策略，當時的社區工作者極力和早期的教會活動與志願服務的文化精神切割。百年來的志願服務工作並未能有效地處理貧窮問題，結構性的問題實需從制度面加以介入。

八、與台灣經驗的對話

台灣在日據時期也有類似「鄰保館」的設立。近年則有社區和大學師法湯恩比館的作法，結合課程在學校所在的社區提供服務。

日人稻垣籐兵衛於 1916 年在萬華設立「人類之家」，是台灣第 1 個睦鄰組織，後來陸續設立 6 處「鄰保館」，包括嘉義鄰保館（1934 年）、台中鄰保館（1936 年）、東勢社會館（1937 年）、彰化鄰保館（1937 年）、豐原社會館（1937 年）以及清水社會館（1937 年）等。

英國湯恩比館的經驗在 1890 年代傳至日本，1897 年社會工作先驅 SenKatayama 在東京設立第 1 個「鄰保館」（Fujita, 2002）。日本據台後把睦鄰中心的經驗引介至台灣，而其運作的方式也隨著設立者有所不同。稻垣籐兵衛是人道主義及無政府主義者，鼓吹台灣人爭取政治地位平等運動，人稱「大稻埕怪傑」。他所設立的「人類之家」為志願服務組織，分為兒童和社會部，透過日常接觸感化和教育民眾以改善貧民生活。兒童部設置「稻垣義塾」收容社區內無就學機會的兒童，社會部提供失業者及遊民「保護教化」，並提倡廢娼運動（莊永明，1989）。

其餘 6 處的鄰保館為半官方色彩，負責運作者多為地方「方面委員」之「社會事業助成會」，是地方團體，以地方行政首長（如知事、市尹）或庄長、街長等為主要代表，會員多為地方慈善家或中上階級者（暨南大學，2006）。「方面委員會」負責調查辦理該地區的社會事業，包括相談指導、保健救療、兒童保護、斡旋介紹、戶籍整理和金錢給予等，類似歐洲教區的濟貧制度（林萬億，2006：140）。

日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設立

睦鄰的中心，和湯恩比館的運作方式有所不同，並沒有人員住在社區，而是社會工作者和地方政府公務員的服務據點（Fujita, 2002）。台灣日據時期的鄰保館大抵也是如此，比較類似社區綜合服務中心。

近年大學和社區發起睦鄰運動，由學生到社區進行調查，並針對弱勢團體提供服務。該活動提供學生跟社區緊密的接觸機會，或可促進大學與社區的互動關係。然而，台灣在引介湯恩比館的經驗時多強調社區和諧和互助的層面，忽略其背後宗教道德教化和菁英主義的色彩。湯恩比館是在回應當時英國日益增多的社會問題，由一群具社會關懷的慈善家所提供，他們看到窮人的處境或心生罪惡感或擔心窮人會造成社會紛擾，本質是慈善家長主義，運用的是比較開明的權威和強調中產階級價值的方式去提供服務。

百年後再審視湯恩比館，重要的是將其「脈絡化」（contextualisation），分析其發生的社會關係的脈絡。面對 19 世紀英國社會的問題，湯恩比館提出的改革方案雖不是首創，但它不斷嘗試新的路線，並和同時期發展的慈善組織會社進行服務理念的辯論，質

疑當時社會價值下對致貧原因的假設，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提出異議。實務實施是從許多可能中找尋創造性行動，湯恩比館實踐的精神值得學習。「關係」是社會工作教育的重要元素，湯恩比館的作法提供生活優越的菁英學生對原本視而不見的周遭人事能進一步理解和關注，並從其間發展新的關係和看見新的方法。然而，湯恩比館強調微觀的人際相互「關係」，忽略了制度層面的結構性議題，及隱含於其中的資源分配和權力元素，而這些不平等關係也在服務過程中被複製和再生產。此外，社區也經常被派系、黨派、階級、性別和年齡所切割，衝突是常態，互助和互惠的「關係」並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需要經營的。

九、結論

19 世紀的英國勞工運動迭起，但當時社區工作呈現的是濃厚的中產階級色彩，以維繫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價值觀，是在修補資本主義體制，而不走向馬克思主義或費邊主義。不論是 Barnett 或是早期的社會改革家 Denslow 和 Hill 都認為階級存在是必然的。Barnett 則希望在湯恩比館服務的學生能保有中產階

級的生活方式，在共同生活中將自助、自我依賴、辛勤和努力的中產階級美德融入教授的課程中，並讓窮人有欣賞高檔的事物的能力。當窮人有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腦袋，即可減少社會的問題。湯恩比館所提供的是大學高等教育的延伸，少談技藝訓練。湯恩比館的本質是家長主義，運用柔性的權威教化窮人。

結構性的問題需要制度性的規劃與公共資源的投入，非單靠志願服務或社區教育得以處理，Barnett 在湯恩比館推行數十年後宣布未能

達至預期的目標，他亦提及晚期徙置的學生思維深度不足，並對當時英國大學教育提出批判；Urwick 也對湯恩比館運作過於重視成果與機械式的操作提出反省，百年後這些建議仍然受用。台灣社會工作學系社區教育的養成多著重技術與技巧的訓練，而重要的是讓學生對社區有更多的理解，在理念上有更深的錘鍊及對生活有多樣的體悟，培養「專家」前先培養「生活家」。

（本文作者黃彥宜現為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書註 釋

註 1：「費邊社」主要是在研究、討論和出版社會主義的論述。他們認為社會改革可以透過漸進、耐心地辯論或把想法滲透進掌權者的圈子而達至。透過教育進行改革也是費邊社所強調，因為他們相信投票者可以被社會主義的正義所說服。費邊社一直和工黨保持獨立的關係（LSE, 2000）。

註 2：Samuel Augustus Barnett 生於西元 1844 年為湯恩比館的創立人，是一位牧師也是社會改革者，畢生於倫敦東區為窮人服務，於 1913 年過世。

註 3：「友好會社」的發展可以追塑到羅馬時期，當初發起者的動機很單純，即一群人若湊足一些共同基金，當有需要時即可從基金獲得援助。1875 年的法案規定「友好會社」需註冊和管理，在 19 世紀約有 27,000 註冊的「友好會社」。在福利國家體制建立前，它是貧窮勞工在生病或年老時唯一的協助來源。在當時若無收入只有在街頭行乞或

是到勞役所去，友好會社提供會員許多協助和服務。

註 4：當時的社會價值認為窮人須為自己的不幸負責，他們需要道德上的革新，需投入工作，需要加以管束。許多窮人無以維生時會進入勞役所，為了避免窮人飽餐後逃走不工作，許多勞役所的設計像監獄，限制入住者的行動，且需穿制服，男女分開住，家庭因此會被拆散，僅在特定時間得以團聚。

註 5：Arnold Toynbee 生於 1852 年，為英國牛津大學講師，畢生鑽研經濟學希望能改善勞工階級的生活。他強調每個人有義務為人道服務而貢獻自己，並相當支持勞工階級教育，後因積勞成疾在 1883 年於 30 歲時英年早逝。著名的著作英國工業革命一書（*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於逝世後出版，1884 年東倫敦區白教堂的湯恩比館即以 Arnold Toynbee 為名，感念他終身為爭取勞工福利及改善工人生活的付出與努力。

參考文獻

林萬億（2006）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台版：五南。

莊永明（1989）台灣紀事，台北：時報出版社。

暨南大學（2006）重返大學睦鄰運動。http://www.spsw.ncnu.edu.tw/Settlement/settlement/books_1.htm

Baldock, P. (1980) The Origins of Community Work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Henderson, P., D. Jones & D. Thomas (eds), *The Boundaries of Change in Community Work*, pp. 25-48.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Barbara D. (2003) Poverty and Families in the Victorian Era .<http://www.hiddenslives.org.uk/articles/poverty.html>

Briggs, A. and A. Macartney (1984) *Toynbee Hall: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antuar, C. (1935) Preface, in Pimlott, A. R., *Toynbee Hall. Fifty Years of Social Progress 1884-1934*, pp. vii-viii. London: Dent.

Daniels, B. (2003) Poverty and Families in the Victorian Era. <http://www.hiddenslives.org.uk/articles/poverty.html>

- iddenlives.org.uk/articles/poverty.html
- Fujita, H. (2002) Early Settlement Houses of Japan and Neighborhood Houses of the City of Osaka. http://www.sanart.org.tr/artengaged/ArtEngagement_HarihikoFujita_Paper.pdf
- Loftus, D. (2006) The Rise of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 http://www.bbc.co.uk/history/british/victorians/middle_classes_01.shtml
- LSE (2000) The Fabian Society. <http://archives.lse.ac.uk/DServer.exe?dsqServer=lib-4.lse.ac.uk&dsqApp=Archive&dsqCmd=Index.tcl>
- Manthorpe, J. (2002) Settlements and Social Work Education: Absorption and Accommodati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21(4): 409-419.
- Mayo, M (1998) Community Work, in Adams, R. et al. (eds), *Social Work: Themes, Issues and Critical Debates*, pp.160-172. London: Macmillan.
- Meacham, S. (1987) *Toynbee Hall and Social Reform 1880-1914: The Search for Commu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imlott, J. A. R. (1935) *Toynbee Hall. Fifty Years of Social Progress 1884 -1934*. London: Dent.
- Popple, K. (1995) *Analysing Community Work: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 Rimmer, J. (1980) *Troubles Shared: The Story of a Settlement 1899-1979*. Birmingham: Phlogiston.
- Seed, P. (1973)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Work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 Waddington, P. (1994) The Values Base of Community Work, in Jacobs, S. & K. Popple.(eds), *Community Work in the 1990s*, pp. 3-12. Nottingham: Spokesman
- Walton, R. G. (1975) *Women in Social Work*.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 Woodroffe, K. (1962) *From charity to social work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